

RSTP 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的适应性转向 ——以迪亚拉案为例

苏圣翔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欧盟法院在迪亚拉案中对《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则》(RSTP)第 17 条及部分国际转会证明规则与欧盟法律的兼容性质疑。基于欧洲足球市场的重要地位,国际足联出台临时框架对转会规则进行了修订,不仅修改了赔偿金的计算方式而且调整了举证责任规定,同时相应更新了签发国际转会证明的程序,新规一方面具有减少惩罚性的进步之处,但另一方面保留了部分不合理内容,具有过渡性质。国际足联承诺进行全球对话以启动转会规则的全方位改革,但欧洲足球方面不满国际足联的单方主导模式,要求其重视欧洲诉求。在未来的改革中,国际足联应将集体谈判协议条款纳入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中,同时成立以足球利益相关方为主体的专门委员会主导改革,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转会秩序。

关键词: 《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则》;欧盟法院;迪亚拉案

中图分类号: G8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6)05-0037-09

DOI: 10.20185/j.cnki.1003-983X.2026.05.007

Chang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STP Rules Regarding Termination of Contracts Without Just Cause: The Diarra Case as an Example

SU Shengxiang

(Soochow University,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uzhou Jiangsu, 215006)

Abstract: In the Diarra case,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questioned the compatibility of Article 17 of the FIFA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 a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Certificate with EU law. Give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European football market, FIFA introduced a provisional framework to revise the transfer regulations, modifying not only th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compensation but also adjusting the rules regarding the burden of proof, while simultaneously updating the procedures for issuing international transfer certificates. While the new regulations represent a step forward in reducing punitive measures, they do not retain certain unreasonable provisions, reflecting their transitional nature. FIFA has committed to a global dialogue to initiate a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ransfer regulations, but European football stakeholders are dissatisfied with FIFA's unilateral approach and demand that it give greater weight to European concerns. In future reforms, FIFA should incorporat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provisions into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termination of contracts without just cause, while establishing a special committee composed primarily of soccer stakeholders to lead the reform and establish a more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system.

Keywords: FIFA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Diarra case

当今世界,足球堪称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球员转会则是足球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统一的转会市场需要稳定且全面的规范进行运转,《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则》(FIFA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以下简称 RSTP)就是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FIFA)在其中设置的规则支柱。

欧洲联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简称欧盟法院)审理并做出裁决的 FIFA v BZ 案(FIFA v BZ, C-650/22,以下简称迪亚拉案)挑战了这一转会规则的合法性,该案不仅成功动摇了包含部分国际转会证明(International Transfer Certificate,以下简称 ITC)规则在内的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其为 RSTP 中的核心条款——而且引起了后续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足球治理面临变革。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为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外延涵盖 RSTP 第 17 条以及部分 ITC 规则,所研讨的主题即是该项规则的适应性转向,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需要适应以迪亚拉案裁决为契机驱动的改革进程与依赖旧制度体系的保守趋势之间的角力,由此其发生两方面的转向,在实体规则上从

收稿日期:2026-08-21

作者简介:苏圣翔(2002~),男,河北沧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国际体育法,E-mail:brursh353@163.com。

惩罚性管控逐步转向考量个案背景与罚责匹配的相称性规制,但仍保留了旧规的限制性内容,在规则形成过程中从 FIFA 单端主导转向涵盖利益相关方的多端推动,但 FIFA 的领导地位仍不可撼动。本文旨在探讨欧盟法院在迪亚拉案中对于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的批评,以及 FIFA 在应对危机时所作出的改革举措,继而讨论这种改革的方向和完善措施,以期为国际体育治理提供更广泛的思考空间。

1 迪亚拉案

1.1 案件背景

2013 年 8 月,法国足球运动员拉萨纳·迪亚拉(Lassana Diarra)与莫斯科火车头俱乐部(Football Club Lokomotiv Moscow)签订了一份为期四年的雇佣合同。随后两者关系出现裂痕,迪亚拉多次缺席训练,球队也暂停发放他的工资。2014 年 8 月 22 日,俱乐部以球员多次违反合同条款为由,决定单方面终止合同。该纠纷先后经国际足联争端解决中心(FIFA Dispute Resolution Chamber,以下简称 DRC)和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简称 CAS)裁决,两机构均认定俱乐部解约具有正当理由,运动员应支付违约金^[1]。

2015 年 12 月 9 日,迪亚拉在比利时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2014 版 RSTP 的 17.1、17.2、17.4 条与欧盟法律相抵触,FIFA 等被告方应支付 600 万欧元赔偿金,因为 RSTP 的适用导致他错过多个就业机会。

2017 年 1 月 19 日,法院经审理后支持了运动员的诉讼请求。随后 FIFA 就该案向比利时蒙斯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Mons)提出上诉。迪亚拉在上诉中主张 2014 版 RSTP 第 9.1 条、第 17 条以及附件三第 8.2.7 条违反《欧盟联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简称 TFEU)第 45 条和第 101 条。上诉法院审理后决定中止诉讼程序,并请求欧盟法院就涉案规则与 TFEU 第 45 条和第 101 条的兼容性作出初步裁决(Preliminary Ruling)。2024 年 10 月 4 日,欧盟法院下达初步裁决,判定相关欧盟法律应被解释为与争议规则不相兼容,除非能够证明争议规则的适用符合比例原则以及存在正当豁免理由。

1.2 欧盟法院初步裁决的基本内容

首先是涉诉规则是否违反 TFEU 第 45 条。法院认为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构成了对球员自由流动的限制。法院查明,第一,RSTP 第 17.1 条规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不仅缺乏可预测性,而且和保障竞赛规律性目标关联不强;第二,RSTP 第 17.2 条和第 17.4 条违反比例原则,因为它们在没有考虑到个案情况下便要求新俱乐部承担责任;第三,ITC 相关条款仅仅因球员单方违约就禁止其转会,并且这种禁令不问具体案情自动适用。由此法院判定涉诉规则与 TFEU 第 45 条难以兼容,不合理地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除非能够证明这些规则没有超出追求合法目标的必要限度。

其次是涉诉规则是否违反 TFEU 第 101 条。欧盟法院认定涉案规则具有反竞争的目的,构成了对竞争的全方位限制。争议规则限制了俱乐部通过自由竞争获取球员这一重要“资源”,这实际上达成了一项横向垄断协议。同时欧盟法院指出争议规则缺乏可预测性和比例性,难以满足 TFEU 第 101 条

第 3 款规定的豁免条件。法院根据以上判断认定涉诉规则与 TFEU 第 101 条不相兼容,除非能够证明第 3 款的豁免条件全部得到满足^[2]。

RSTP 第 17 条及相关规则维系着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支撑着饱受争议的转会市场二十余年间的存续,欧盟法院虽未直接否定 RSTP 第 17 条的效力,但经此判决,其与欧盟法律不相兼容的疑云已笼罩足球世界,为此 FIFA 必须作出变革。

2 临时框架:规制路径的沿袭与相称性转向

迪亚拉案的裁决在理论与实务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不仅是因为欧盟司法系统对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提出的合法性疑虑,也因为争议规则存续十余年所影响的球员数以万计,更多的运动员受迪亚拉案的启发,希望向法院提起针对体育联合会的诉讼,这也是迪亚拉案被称为“第二个博斯曼案”的原因之一^[3]。面对巨大的司法压力,FIFA 必须对现行足球转会制度进行改革,但为防止庞大而复杂的转会市场陷入混乱,FIFA 选择了平稳过渡的方案,即通过“微创手术”的方式率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合规性问题,从而将全面改革的节点分摊在更长的时间轴上,减缓变革带来的冲击。FIFA 于 2024 年 12 月颁布的 RSTP 临时监管框架(interim regulatory framework,以下简称临时框架)正是方案的第一步。相比原条款,临时框架主要存在三项变更,分别是修订违约金计算方式、修改举证责任规定、调整 ITC 签发程序,现依次进行分析。

2.1 违约金计算条款

2.1.1 修改计算标准

FIFA 在临时框架中修改了 RSTP 第 17.1 条中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新条款删除了“客观标准”相关内容,只保留了原有“相关国家的法律”标准。虽然多项计算标准在文本意义上被删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被适用于后续案件的裁判中^[4]。FIFA 未在临时框架中说明何种标准不再被适用,明确这一问题必须结合迪亚拉案的判决进行分析,欧盟法院真正批评从而被 FIFA 剔除的标准有:体育特殊性;球员根据新合同应获得的报酬和其他福利;原俱乐部产生的且与运动员无直接关联的费用和开支^[5]。三项标准的剔除对于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的完善是一项进步,它使得原条款具有的严厉和惩罚性大大削弱。

首先,“体育特殊性”计算标准的适用存在模糊,将其剔除增加了赔偿的确定性。尽管在 RSTP 中它被列为一项“客观标准”,但体育特殊性概念外延范围极广,规则没有对其作任何限定。在赔偿金的案件中,它被 CAS 视为一项根据其他标准计算之后用于灵活调整的因素,设置目的在于为足球法庭提供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使裁决结果充分反映出足球世界的特征^[6],亦即体育特殊性追求一个合理的金额,但合理的概念由裁判者界定,涉诉球员可期望的只是“足球世界的特征”这一模糊的词汇。在 Matuzalem 案中,CAS 仲裁庭根据球员在队内的核心位置和离队时机等因素,依据体育特殊性判处球员额外赔偿 60 万欧元^[7];而在 La Equidad 案中,仲裁庭根据球员在原俱乐部薪资较低的情况,减少了球员应付的赔偿金额^[8]。对于体育特殊性的确定,CAS 仲裁庭采取的是个案甄别的方法,

这就意味着先前案件确定的判断思路可被参考,但不会必定被遵守。因此,体育特殊性难以作为一项清晰的赔偿金计算“客观标准”,它的适用既缺乏明文限定,又缺乏先例约束,解释权由仲裁庭高度掌握,运动员无法对此进行合理预期。

其次,“球员根据新合同应获得的报酬和其他福利”标准使得无关事由被纳入,从而使得赔偿金额过高而带有惩罚性。该项标准常被仲裁庭用以计算原俱乐部因球员违规解约而失去的经济价值,但这两者之间实际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为未来的薪酬不必然反映球员的市场价值,更和原俱乐部损失的经济价值没有直接关联,该条款假定球员在原俱乐部持续保持正常竞技水平本就是脱离现实的设想,更何况“其他福利”为这一标准的考量增添更多不确定的无关因素^[9]。CAS 本身即在 Webster 案中作出过相关裁决,认定依据新合同薪资估算经济价值将“导致俱乐部不当得利,并对球员构成惩罚性措施”^[10],不过 CAS 在后续判决中没有采取该观点,导致这一标准的负面影响持续多年,直至临时框架将其排除。

最后,“原俱乐部产生的费用和开支”这一标准同样被删除,但需注意这一标准涵盖的事项并未全部失效。不再考虑的只是其中与球员不存在直接关联的因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俱乐部付出的转会费,该项目数额庞大且其协商过程中通常排除运动员的参与,使得赔偿金额过高具有惩罚性,将原俱乐部未摊销的转会成本作为球员的负担,实际上消除了俱乐部本应承担的市场风险,从而最大限度维护了俱乐部的利益。综上,出于合规目的而制订的临时框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当剔除多项无关且模糊的标准后,预计赔偿金数目将大幅缩小,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的惩罚性也随之减弱。

保留“相关国家的法律”不难理解是对迪亚拉案判决的回应。在裁判中法院称 FIFA 只是在此列明适用国家的法律可能性而不是必然遵守,实际上 CAS 和 DRC 从未将国家法律实质纳入赔偿金计算中,因为国家法律具有多样性,而足球法庭需要统一且平等的赔偿标准,所以在规则适用顺序上总是先适用 FIFA 内部的规章,国家法律只是起到补充作用^[11],而且此处的国家法律范围狭窄,通常只指 FIFA 总部所在国瑞士的相关法律^[12],欧盟法院明显不满这一计算标准的适用方式。因此新修订的赔偿金计算框架建立在参考个案具体情况基础上,以“积极利益”(positive interest)为原则,考虑所遭受的损害的同时适当考虑“相关国家的法律”。但必须关注到 FIFA 在此处未全盘采纳欧盟法院的意见,“相关国家的法律”在临时框架中被定位为一项“适当考虑”的计算标准,这和迪亚拉案之前的参考定位没有本质区别,临时框架出台后也未有将国家法律作为主要裁判依据的案例。国家法律与 RSTP 规则的潜在矛盾将在国际转会中被放大,FIFA 不会接受分属不同法域的球员和俱乐部适用彼此矛盾的规则而造成的法律风险,因此其采取了一种兼顾但无实效的方法:唯一保留国家法律作为参考标准,但不赋予其优先地位。

2.1.2 确立“积极利益”原则

临时框架在剔除“客观标准”后,转而将“积极利益”确定为计算赔偿金的基本原则,这不利于消除规则的模糊性。“积极利益”原则看似是 FIFA 新设内容,但实际上该项原则和其他多项损害赔偿原则早已被 CAS 多次运用,且已形成稳定的

判例法。足球领域的“积极利益”原则确立于 Matuzalem 案,旨在使违约受害方恢复到合同未违反时的状态^[13],在该案中为达到这一目的,CAS 将俱乐部已丧失的球员转会价值以及服务价值等多项因素考虑入内,最终赔偿数额远超球员可承受范围。迪亚拉案之前的众多判例说明,虽然 CAS 对于赔偿金的计算保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14],但在剩余价值原则,以及 DRC 采取的平均值方法等计算思路中,“积极利益”原则仍是 CAS 裁判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案件中应用的主流评估方法^[15]。

这也就意味着,FIFA 推出的新赔偿条款的核心计算原则是其被欧盟法院评为模糊的足球裁判实践中早已施行多年的判例法。临时框架在剔除多项“客观标准”后,预计将缩小违约金数额,但唯独确立“积极利益”原则的做法使得球员无法合理预期赔偿金数额。因为阅读如今的 RSTP 第 17.1 条文本内容,除去“积极利益”原则和“相关国家的法律”,球员不会发现其他可参考标准,对于前者,相当一部分判例因为临时框架的缘故不再具备参考价值;对于后者的适用,运动员难以找寻到任何有意义的案例。过往的判例表明,多项惩罚性赔偿标准在仲裁中存在适用空间源自“积极利益”原则本身具备的模糊性和自由裁量性^[16],这种一脉相承的不确定性表明在未来的审判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出现更加隐蔽的因素以阻碍自由流动和竞争。

2.1.3 临时框架下赔偿金计算实例

DRC 于 2025 年 3 月裁决的 FPSD-13969 号案件是首批临时框架下球员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案件,在该案中 Mas-safi Al-Jonob 俱乐部指控球员穆萨(Musa)无正当理由终止与其签订的雇佣合同,要求球员和新俱乐部支付赔偿金并接受体育制裁。经审理,DRC 部分支持原俱乐部的诉讼主张,最终裁决球员应赔付违约金 13 500 美元^[17]。现依次分析该案展现出的四项适用要点。

第一,明确“积极利益”为计算的基本原则。DRC 在该案中应用并再次诠释了“积极利益”原则的含义:受损方应处于若未发生违约且合同已适当履行的状态。DRC 在临时框架下对该原则的释义与以往的判例并无二致,这意味着该原则不仅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改变,它仍保留着过往案例中具有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它擢升为应予适用的赔偿金计算原则,这将放大其弊端。

第二,临时框架排除的计算标准不再予以适用。DRC 明确驳回了本案中原俱乐部以体育特殊性为由主张的赔偿金,理由是该项因素已不再是 RSTP 第 17.1 条的赔偿标准,这与上文所述的临时框架修改思路相一致。

第三,原 RSTP 中规定的“现有合同的剩余期限”虽在临时框架被删除,但仍应纳入计算范围。DRC 认为球员根据现有合同而不是新合同得到的薪资,准确反映了球员在违约时的市场价值,计算俱乐部的损失金额应以该数目为基准,现有合同的剩余履行期限则反映了球员和俱乐部本应适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而该案中的现有合同剩余价值则是这两项因素结合下的计算结果,因此 DRC 支持了原俱乐部根据现有合同提出的赔偿诉求。

第四,原俱乐部产生的且和球员直接关联的因素仍应进行考量。该案中原俱乐部要求球员赔偿雇佣期间为其支付的

机票和注册费用,虽然 DRC 最终驳回了这项诉求,但理由是原俱乐部没有提交付款证明而非该项因素不相关,意即 DRC 认为机票和注册费用可以作为赔偿要素,这印证了笔者前文的观点,即原 RSTP 中的“原俱乐部产生的费用和开支”没有被欧盟法院在总体上否定而失去价值,真正被排除的只是其中与球员无直接关联的因素,例如未摊销的转会费用。

2.2 举证责任重新配置

在旧版 RSTP 中,第 17.2 条规定新俱乐部和违约球员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CAS 的一贯判例,新俱乐部自动承担共同赔偿责任^[18],无需存在过错或疏忽,并且此处的赔偿责任属于一种连带赔偿责任(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in general),新俱乐部和球员的责任没有主从之分^[19]。第 17.4 条规定保护期内违约或诱导球员违约的俱乐部将面临体育制裁。新俱乐部签下违约球员将自动视为诱导违约,新俱乐部应举出明确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不存在诱导行为,并且经过 CAS 判例确认这一证据标准较高,仅凭当事方陈述不足以为新俱乐部摆脱嫌疑^[20]。

FIFA 根据迪亚拉案的裁决修改了第 17.2 条的连带责任规定,根据临时框架,只有在索赔俱乐部成功证明存在诱导球员违约行为时,新俱乐部才应承担连带责任。第 17.4 条的修改之处与第 17.2 条相似,根据临时框架,新俱乐部不会再被自动推定为诱导球员违约,除非索赔俱乐部能够成功证明这一事项。综上,临时框架重新配置了条款中的举证责任,充分考虑个案的实际情况,只有索赔俱乐部证实诱导违约发生,新俱乐部才会承担经济赔偿和体育制裁责任。

举证责任的重新配置减少了条款的不合理之处,无疑是一项进步。在过往的转会条款下,即使球员愿意承担巨大的经济和体育风险离开原俱乐部,也鲜有俱乐部愿意接纳,因为新俱乐部必定与球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且被自动推定为诱导违约,面临多个赛季无法注册新球员的体育制裁。新俱乐部需要承担额外的举证责任以证明其不存在诱导违约行为,如上文所述这一证明标准相当高。此种不考虑个案情况的归责条款,应被归属于具有惩罚性质的不利推定规则,即使在刑法领域类似规则也早已弃置,其却重新在私主体协会具有合同法属性的规章中“复活”,这不仅远远超出 FIFA 声称的保障合同稳定性的需求,更背离了现代法治的发展方向。基于旧规,球员往往将失去本应获得的工作机会,本案中迪亚拉的遭遇正是这一方面的鲜明事例。在与莫斯科火车头俱乐部的关系降到冰点后,迪亚拉一直寻求新的雇主,但由于 RSTP 的上述限制,新俱乐部面临巨大的经济和体育风险,这导致他失去多个潜在就业机会。临时框架调整了第 17.2 和 17.4 条中的举证责任,不仅减轻了新俱乐部的雇佣风险,而且减少了条款的不合理性,使其符合欧盟法律要求和时代发展方向。

但正如前文所述,FIFA 无意拆毁其亲自建立的转会市场,它更多期望临时框架能针对性消除旧规与欧盟法律不兼容之处,从而最小化修订影响,因此 17.2 和 17.4 条款的从未变更,新俱乐部仍被限制自由招募意向球员。FPSD-14413 案是临时框架下以第 17.2 条为重点进行裁决的案件,在该案中 New York Red Bulls 俱乐部指控球员 Gamarra 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要求签下 Gamarra 的新俱乐部 Al-Taawoun

FC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审理,DRC 裁决在无法判断球员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从属地位的新俱乐部不应负担连带责任^[21]。DRC 明确指出临时框架虽然恢复由主张者承担证明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改变对第 17.2 条的理解与适用。在 DRC 的视野里第 17.2 条保障原俱乐部得到赔偿的目的没有改变,该条款对球员与新俱乐部的责任划分同样没有改变,新俱乐部依然需要承担从属于球员与原俱乐部债务关系的连带责任。通过 DRC 对临时框架的适用与解释,不难推理出修订后的第 17.2 和 17.4 条仅仅改变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条款其余部分的应用仍和迪亚拉案之前如出一辙。

回顾迪亚拉案的裁决会发现,欧盟法院无疑批评了第 17.2 和 17.4 条中的上述不合理之处,但实际上它旨在说明的是这些条款构成一项禁止单方面招募在职球员的命令,这项禁令使得俱乐部间达成“禁止挖角”协议(no-poaching agreements),人为地划分了市场,从而本质上限制竞争。反观临时框架的确排除了条款的严苛部分,但第 17.2 和 17.4 条限制俱乐部自由招募球员的内容没有改变。欧盟法院认可 FIFA 提出的维护体育竞赛规律性的目标,但同时指出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不应超出必要范围,更不应严重限制竞争,这意指 RSTP 应平衡追求合法公共利益目标与遵守欧盟法律的需求,但 FIFA 无意大幅度调整转会规则以全方面迎合,17.2 和 17.4 条款背后的天平仍向所谓的合同稳定性倾斜。

2.3 调整 ITC 签发程序

FIFA 对有关签发 ITC 的规定作出修改,扫除了违约球员转会的程序性障碍。临时框架规定:原协会不再有权拒绝签发转会所需的 ITC;原协会应在新协会请求 ITC 后 72 h 内作出回应,若超时新协会可为球员进行注册;明确球员所涉合同争议不影响 ITC 的签发。ITC 是国际转会的必备文件,在先前的规定中球员很可能因为纠纷缠身而无法在新俱乐部注册,这导致即使付出了巨额的赔偿金,球员仍无法代表新俱乐部参加比赛^[22]。新俱乐部不仅将承担连带赔偿以及体育制裁责任,而且无法获得球员参赛的回报,这一惩罚性的规定极大地增加了俱乐部招募球员的风险。临时框架则清除了程序性障碍,将 ITC 的签发与球员的合同争议相分离,促进了球员的自由流动。

卢卡斯·里贝罗·科斯塔(Lucas Ribeiro Costa)的转会事件是这一方面的范例,他在 2025 年 8 月 1 日单方面终止了与南非 Mamelodi Sundowns FC 俱乐部并选择加盟西班牙的 Cultural Leonesa 俱乐部,尽管球员声称有正当理由离队,但此时他在南非的球员合同距离到期还有 3 年,此时如依据迪亚拉案之前的规则,科斯塔因为合同争议不会得到 ITC,从而无法顺利注册,球员原俱乐部和协会实际上也不愿给予新协会 ITC,但在 72 h 等待期后,FIFA 介入并为球员在新俱乐部和协会注册,从而球员顺利转会得以正常参赛^[23]。球员与原俱乐部之间的争议解决还会持续进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已经不能再阻碍球员效力新俱乐部。

综上,临时框架沿袭了旧规中禁止俱乐部间“挖角”的内容,球员——这一竞争核心“资源”在新规下的流动仍受限制,俱乐部仍可通过设定巨额违约金条款、证明诱导违约等手段限制球员转会^[24]。但同时其中蕴含的进步性不得忽略,临时框

架将迪亚拉案的裁决作狭义解释,有针对性地删除计算赔偿金的“客观标准”,重新配置诱导违约的举证责任,修改 ITC 的签发规定^[25],其剔除了旧规中的严厉性和惩罚性,转向了一条罚责相当、个案衡量的相称性规制路径。

3 谁来领导改革:从单方主导到多方共治的转向尝试

面对欧盟法院在迪亚拉案的裁决,包括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在内的 RSTP 需要革新以符合法律和时代的要求,对临时框架的分析提示了转会规则在内容方面的未来方向,但改革与转向不会局限于规范本身。越来越多的体育组织不满 FIFA 在足球管理中近似垄断的地位,它们希望得到与之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与 FIFA 一同参与足球治理而不是在其领导之下。

3.1 单方主导的足球治理结构存在合法性疑虑

FIFA 在足球治理中的垄断地位受到多方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以 FIFA 为主导的足球治理模式在合法性方面存在多项问题。

首先,FIFA 和大多数国际体育联合会一样,对足球体育治理的结构采取的是“金字塔”式的垄断布局,这种模式缺乏民主性。在这种结构下,位于最底层的现役球员难以将话语传达到最顶层的 FIFA,即使意见跨越了其中涉及俱乐部、国家协会等“金字塔”的多个层级,FIFA 也不会当然地把此事纳入议程,原因在于 FIFA 的监管权基础不会因为缺乏球员的合同授权或同意而失效,它的权力极大程度上归于事实性^[26]。

其次,以 FIFA 为主导的足球治理结构限制球员寻求外部救济途径。在足球世界中,内部仲裁机制的管辖权规则作为一项格式条款列明在赛事或注册协议中,因此球员通常不能在纠纷发生时首选外部司法救济,很长一段时间内 CAS 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是事实上的“最高法院”^[27]。FIFA 作为体育联合会,一贯秉持体育自治与政治中立的宗旨,换言之 FIFA 排斥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传统国家政府或法院在多数情况下选择与 FIFA 合作,原因之一在于 FIFA 位于足球世界的顶端掌管着足球治理的重大事项,拒绝与其合作不利于提升国家的体育影响力^[28],而且基于体育的特殊性,传统治理结构难以深入并改变这一事态,贸然干涉无疑会分裂足球世界统一的规则和架构。严格的内部处罚虽然被 FIFA 宣称限于私主体的纪律范围内,但对于球员职业生涯的惩罚性已不亚于传统法律制裁^[29],在传统司法救济缺位的格局下,球员被迫高度服从以 FIFA 为主导的足球治理体系。

最后,在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FIFA 内部治理情况令人忧虑。从 2015 年被曝光多名高层成员深陷贪腐丑闻^[30]到申报世界杯的贿选风波^[31],FIFA 内部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一直饱受诟病,尽管其拥有内部监督机构,但其在保持独立和发挥实际作用的方面受到质疑^[32],FIFA 兼具监管者和商业赛事组织者的双重身份使得这一问题更应谨慎看待。在缺乏其他机构制衡的情况下,以 FIFA 为主导的单方治理结构极易滋生腐败。FIFA 不应享有不可质询的垄断地位,它所行使的监管权力应受到合法性方面的审查,在“后迪亚拉”即传统足球治理迎来多重问题的时代更应如此。

欧盟法院本可借迪亚拉案对以 FIFA 为主导的足球治理模式的合法性质疑,继而促成改革,但它选择了忽视。与

Meca-Medina 案裁决公布时的抵触态度不同,FIFA 欣然接受迪亚拉案的裁决,将其视为现代化转会框架的契机^[33],这主要是因为欧盟法院不仅忽略了对 FIFA 监管权力的审查,而且在极大程度上认可了 FIFA 事实上制定规则并监督实施的地位^[34],FIFA 乐于看到此类认可,正如它在众多国家极力游说并力图获得独立。尽管法院不想过多涉及这一与争议无关且颇为危险的话题,但裁决的这部分内容确实是一项遗憾。

3.2 欧洲足球组织推动构建多方共治格局

与欧盟法院不同,以迪亚拉案为契机,欧洲体育组织抓住了破除以 FIFA 为主导的足球治理结构的机会,它们希望真正参与到包括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在内的 RSTP 的改革。迪亚拉案之后,FIFA 提出与相关利益方以全球对话的方式对 RSTP 进行修改,但代表欧洲足球的“欧盟职业足球部门社会对话委员会”(EU Sectoral Social Dialogue Committee for Professional Football,以下简称对话委员会)于 2025 年 12 月率先提出了具有欧洲特色的解决方案——《欧洲社会伙伴关于足球转会制度关键原则及其改革的决议》(Resolution of European social partners on the key principles of the football transfer system and its reform)。该项决议强调遵守欧盟法律并维护欧洲劳动力市场,肯定合同稳定性原则,其中特别主张加强国家争议解决机构的作用;推动多方集体谈判以确定经济补偿标准。这一秉持强硬态度的决议,在内容上完全基于欧盟法律制定,其目的也在于指导 FIFA 的全球对话与未来改革^[35]。该协议优先考虑欧洲足球利益,强调欧洲的重要地位,展露出欧洲足球管理机构实质参与改革的意图。

欧洲足球之所以如此强势,首先在于其在足球转会市场的地位显著,对话委员会称欧洲足球占据全球转会市场的近 90% 份额。很少有人质疑如今职业足球的重心在欧洲,欧洲足球的竞技水平和经济价值远超其他地区,这也是 FIFA 在迪亚拉案后迅速调整转会框架的原因之一,如果 FIFA 失去欧洲足球其地位将一落千丈。其次,欧洲足球与 FIFA 存在分歧,双方积怨已久。欧洲足球不满 FIFA 在不展开广泛协商的情况下,贸然确定包括联赛日程等一系列重大安排,在利益分配上双方主张亦有不同,在 FIFA 内部饱受质疑的背景下,这一反对情绪愈加高涨。2024 年 6 月英格兰职业足球运动员工会(Professional Footballers' Association)和法国球员联盟(Union nationale des footballeurs professionnels)向布鲁塞尔商事法院(Brussels Court of Commerce)提交了法律诉讼,指控 FIFA 忽视球员和俱乐部的意见,单方面决定比赛日程^[36];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欧洲分部(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ers' association Division Europe,以下简称 FIFPRO Europe)于同年 10 月向欧洲联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简称欧盟委员会)提起了反竞争投诉,控告 FIFA 滥用主导地位,不顾球员安全强加繁重赛程^[37]。最后,遵守欧盟法律的现实要求让两者的分歧更加明显。欧盟法院已在多份判决中对 FIFA 的规章以及行为提出合法性质疑,这向 FIFA 提出如何协调欧盟与其他地区法律的难题。FIFA 的监管框架不只限于欧洲,但欧洲方面则不需要顾及这种问题,他们将遵守欧盟法律的要求放在首要位置,希望获得与其市场份额相匹配的关键地位。

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以及其所附属的 RSTP,在迪亚

拉案后的改革中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不仅在内容上借由临时框架剔除了诸多过分严苛的惩罚性条款,而且在主体上迎来了更多的参与者,以欧洲方面为代表的足球组织希望与 FIFA 并肩进行改革。虽然目前临时框架仍由 FIFA 为主导制定且其内容具有过渡性质,但今后对 RSTP 以及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的改革已经向全新的方向迈进是不争事实。

4 未来的方向

4.1 确立集体谈判协议的优先适用地位

未来对于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的修改,FIFA 应在条款中将集体谈判协议的适用放在优先位置,具体来说,以如今的 RSTP 第 17.1 条第 3 项为模板,新设第 17.1 条“当雇主和雇员双方代表根据国家法律在国内层面协商的劳资协议与下文的原则冲突时,以该劳资协议的条款为准”。此处的国家法律和国内层面应作体育上的广义解释,包括欧盟等超国家组织。集体谈判指的是劳动者与雇主双方通过组织或代表的方式就工作条件、雇佣关系、争议解决等多项问题展开的全部谈判,在该过程下达成的即为集体谈判协议^[38]。体育领域目前的集体谈判主要分为美欧两种模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体育联合会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美国模式下集体谈判由职业联盟和球员工会两方参与,体育联合会被排除出谈判行列,在该模式下球员与雇主间的谈判强调最大化利益下的对抗;欧洲模式下的集体谈判则由俱乐部协会、球员协会以及体育联合会三方进行,政府部门有时也会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体育联合会即使在特定实践中不作为集体谈判协议的签署方,仍在谈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9]。该模式更强调依赖多方开展的社会对话推进集体谈判,体育联合会和政府机构往往在其中发挥居中调停的作用。

改革后的 RSTP 将采用何种模式规制集体谈判高度依赖于特定国家的实践,因此 FIFA 不会在全球层面上统一谈判模式,其更倾向于担任协议审核的角色,但至少对于目前欧洲足球的改革进程,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仍需要体育联合会的高度参与,原因不仅在于历史上联合会在构建欧洲足球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地位,更是在于集体谈判将涉及 FIFA 与欧洲、欧盟司法机构与体育组织、不同国家中劳资双方等多个潜在的利益冲突方,此时需要体育联合会从中协调以推进达成集体谈判协议。

将集体谈判事项纳入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并置于优先地位具有可行性。首先,劳资领域的集体谈判协议在主要法系国家具有合法性基础。以欧盟为例,TFEU 第 152—155 条专门建立了包括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在内的欧盟层面的社会对话机制,在该机制内,劳资双方可以经由欧盟委员会协调开展对话从而达成协议,协议内容由劳资双方独立确定,如果双方希望协议效力得到更广范围的认可,还可经由欧盟委员会提案由欧洲联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通过从而颁布为一项欧盟指令。美国亦有《国家劳工关系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of 1935)以及相关的司法判例支持劳资双方开展集体谈判^[40]。

其次,集体谈判协议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存在丰富先例,证明其实践上的可行性。美国职业体育行业的集体谈判模式经

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特实践,以橄榄球领域为例,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员协会(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Players Association)自 1960 年起便就球员工资、转会等事项展开谈判,于 1968 年签订第一份集体谈判协议,在历经 Mackey 案以及 Whiter 案以及多次罢工停摆后,如今于 2020 年生效的协议涵盖球员职业生涯收入、自由球员制度、职业保险等多方面事项,极大地维护了球员的合法利益^[41]。欧洲足球也曾在欧盟层面上有过集体谈判的实践,2012 年 4 月由欧盟委员会认可的对话委员会在 TFEU 设定的社会对话框架下达成一项集体谈判协议,其中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作为监管方,FIFPRO Europe 代表欧洲职业球员作为劳动者一方,欧洲职业足球联赛(European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s)和欧洲足球俱乐部协会(European Club Association)代表雇主一方,协议主要规定了欧盟及欧足联成员协会范围内职业球员标准合同应涵盖条款的最低要求。

最后,集体谈判协议纳入无正当理由由合同条款具有文本上的先例。在 FIFPRO 于 2015 年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对 FIFA 的投诉后,2017 年双方达成一项为期六年的足球治理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 FIFA 于 2018 年 4 月对 RSTP 进行了修订,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在第 17 条中新加入了劳资双方协商的集体协议的优先性,但是只优先于向球员支付的赔偿金计算条款。因此将集体谈判协议条款纳入第 17 条具有可供借鉴的先例,所作修改只是将该项条款的优先范围变更为第 17 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其中单独条款,同时将该项条款调整为第 17.1 条,原条款序号依次下调但顺序不变,不会大幅度更改原本的逻辑结构。

以引入集体谈判协议为方向的改革具有价值,其合理关切到多方利益,可化解 FIFA 目前面临的权力矛盾。首先,对于球员来说,他们不再是金字塔结构的最底层人士,在过去他们的诉求难以从下层穿越数个层级到达 FIFA 决策层,FIFA 也一向缺乏动力维护他们的权益,在引入集体谈判后,球员通过球员协会与体育联合会处于平等的谈判地位,而球员协会高度依赖球员的认可,他们乐于反映球员的利益,由此球员的话语将得到真正的重视。其次,对于俱乐部协会、联赛协会等非 FIFA 体制下的足球管理机构来说,他们不再受 FIFA 依据事实性权力单方强加的命令约束,以欧洲足球为例,在欧盟委员会批准下成立的对话委员会,可以就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条款提出专为欧洲模式设计的协议,无需再依据 RSTP 进行处理,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最后,对于 FIFA 来说看似自身权力受到削减,但实际上这巩固了它的监管地位。在达成集体谈判协议的领域,FIFA 无需再担任饱受诟病的多重角色,而可将主要目标放在监管措施执行等方面,其仍继续掌握足球领域的裁判权。并且转会领域的集体谈判协议存在豁免于欧盟竞争法的可能性,基于奥尔巴尼豁免(Albany exemption)的实践^[42],当一项集体劳动协议是由雇主和雇员在集体谈判框架下达成的,并且旨在改善劳动者的就业和工作条件,也就是同时符合“集体性质”和“积极目的”两项要求时^[43],可豁免于欧盟竞争法的限制性规定,这就为 FIFA 通过集体谈判协议的方式,化解转会规则与欧盟竞争法的兼容性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是迪亚拉案中总法律顾问所暗示的解决路径^[44]。

4.2 成立规则改革委员会

在规则改革的主导机构方面,应确立以专门委员会为主体的模式。目前的转会制度变革以 FIFA 为主导,其余成员例如欧足联、FIFPRO 等组织只是作为协助方进行参与,它们或许能以自身地位为由对 FIFA 施压以采取建议,不过这远不足以构成制度保障,而且此种做法的后果之一是众多游说力量较弱的足球协会难以参与到决策中。不管是以 FIFA 为主导抑或是以欧洲足球为主导,都与 FIFA 主张的全球对话与协商相去甚远。

必须承认 FIFA 在当今足球治理秩序中的核心位置,但也要认识到 FIFA 从未直接参与到足球竞赛中,反而是球员、俱乐部等缺乏规则修订参与权的利益相关方与赛事深度关联,后者如上文所述希望实质参与到规则的改革进程,因此应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主导规则改革,保障修订后规则能最大限度反映出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不至于沦为 FIFA“一言堂”的产物^[45]。在运行机制上,该委员会可参照 TFEU 第 152—155 条提出的社会对话机制进行构建,目前 RSTP 面临的修订问题是从草案到批准皆由 FIFA 单独控制,其他方参与有限缺乏制度保障,欧盟的社会对话机制可为破除这一障碍提供范本,这不仅是因为该项制度历史悠久且成果显著具有一定价值,而且也尊重了目前足球治理的事实格局^[46]。具体而言该委员会由球员代表等劳方以及俱乐部代表,足球联合会等资方,如同欧盟委员会在社会对话机制中的指导作用,FIFA 在该委员会也应占据相应地位,这首先是因为 FIFA 在世界足球治理格局的龙头地位不可撼动,一项规则的出台难以绕过 FIFA 的认可,其次因为 RSTP 终究是 FIFA 足球规则体系中的一块拼图,其在 FIFA 理事会(FIFA Council)的批准下生效源于现存制度的必然要求。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作为修订内容的规则文本必须由劳资双方协商一致诞生,换言之是经双方认可的产物,FIFA 必须尊重协商结果,一方面这消除了上文提出的合法性疑虑,同意生效这一合同法领域的机制代替了过往 FIFA 单方强加的生效模式,另一方面规则文本主要由劳资双方协商诞生,保障了足球世界利益相关方的实质参与,可充分反映直接参与赛事的运动员、俱乐部等群体的切身诉求。目前 FIFA 没有出台专门文件对该类劳资双方为主体的委员会的运作模式作出解释,但毋庸置疑的是委员会的关键地位需要得到尊重,参照欧盟层面的社会对话机制,未来关于 RSTP 的修订可由 FIFA 首先提出修订意向和草案,由委员会进行审议是否决定修订以及修订方向,在同意修订后开始第二轮程序,即由 FIFA 总结第一轮成果并提出关键修订主题,由组成委员会的劳资双方开展谈判与磋商,最终作为对话成果的规则文本交由 FIFA 理事会批准生效。

5 结语

在欧盟法院作出裁决后,迪亚拉于 2025 年 8 月重启比利时国内法院的诉讼程序,并向 FIFA 索赔 6 500 万欧元,2026 年 6 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宣告这场历经 12 年的法律纠纷落下帷幕,但迪亚拉案对足球世界的影响远未结束。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在迪亚拉案后的发展应被视为一种适应性转向,在内容上,为适应欧盟法律剔除了诸多严苛且具有惩罚效

果的条款,这种顺应法治潮流的进步性应当受到欢迎,但本质上临时框架是旧条款与新判决妥协的产物,其中仍遗留了相当比例的陈旧规则,限制球员自由流动与市场竞争的内容没有改变;在治理主体上,出现了由 FIFA 主导转向多元治理的新趋势,这使得改革更加合理,但限于 FIFA 事实上的权力,目前 FIFA 的主导地位仍不可撼动。在未来改革中,集体谈判协议应加入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并占据优先适用地位,最为关键的是集体谈判能打破足球治理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略显激进的内容自然不能依赖于 FIFA 单方主导的改革,以足球利益相关方为多元主体的改革委员会此时就显得十分必要。足球治理尤其是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规则在内的转会制度将迎来全方位变革,如果将其比作黎明,本文所描述的迪亚拉案后的临时框架诸项内容即为暗淡的曙光,黎明固然十分重要,但其不可能脱离曙光无征兆地诞生。

参考文献:

- [1] Bellia O D. CAS 2015/a/4094, Lassana Diarra V. FC Lokomotiv Moscow, Award of 27 may 2016 [M]//Duval A, Rigozzi A.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2016. The Hague; T. M. C. Asser Press, 2017: 317–332.
- [2]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v BZ(C-650/22), Judgment of the Court (Second Chamber) [EB/OL]. (2024-10-04) [2026-03-0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62022CJ0650>.
- [3] Sternheimer W, Ongaro O, Cisneros B, et al. Diarra vs FIFA's RSTP – Bosman 2.0? [EB/OL]. (2024-10-07) [2026-03-01]. <https://www.morgansl.com/en/latest/lassana-diarra-fifa-rstp-transfer-system-illegal-cjeu-bosman>.
- [4] CAS. Arbitration CAS 2019/A/6463 & 6464, Saman Ghoddos v. SD Huesca & Östersunds FC & Amiens Sporting Club & FIFA and ? stersunds FK Elitfotboll AB v. SD Huesca & FIFA & Saman Ghoddos & Amiens Sporting Club, award of 10 November 2020 [EB/OL]. (2020-11-10) [2026-03-01]. <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6463,%206464.pdf>.
- [5] Hessert B, Goh C L, Anderson J. Elgar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ports Law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5: 69–72.
- [6] CAS. Arbitration CAS 2018/A/5607 & 5608 SA Royal Sporting Club Anderlecht (RSCA) v. Matías Ezequiel Suárez & Club Atlético Belgrano de Córdoba (CA Belgrano) and Matías Ezequiel Suárez & CA Belgrano v. RSCA, award of 22 January 2019 [EB/OL]. (2019-01-22) [2026-03-01]. <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5607,%205608.pdf>.
- [7] CAS. Arbitration CAS 2008/A/1519 & 1520, FC Shakhtar Donetsk v. Matuzalem Francelino da Silva & Real Zaragoza SAD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and Matuzalem Francelino da Silva & Real Zaragoza SAD v. FC Shakhtar Donetsk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award of 19 May 2009 [EB/OL]. (2009-05-19) [2026-03-01]. <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1519,%201520.pdf>.
- [8] CAS. Arbitration CAS 2016/A/4550 & 4576, Darwin Zamir Andrade Marmolejo v. Club Deportivo La Equidad Seguros S.A.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and Újpest 1885 FC

- v. FIFA, award of 24 November 2016[EB/OL].(2016-11-24)[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4550,%204576.pdf>.
- [9] Issa M R. Damages and Compensation in Case of Breach of Contrac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5, 3 (1): 190.
- [10] CAS. Arbitration CAS 2007/A/1298 & 1299 & 1300, Wigan Athletic FC v/ Heart of Midlothian and Heart of Midlothian v/ Webster & Wigan Athletic FC and Webster v/ Heart of Midlothian, award of 30 January 2008 [EB/OL].(2008-01-30)[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1298,%201299,%201300.pdf>.
- [11] CAS. Arbitration CAS 2019/A/6525 Sevilla FC v. AS Nancy Lorraine, award of 14 April 2020[EB/OL].(2020-04-14)[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6525.pdf>.
- [12] CAS. Arbitration CAS 2007/A/1369 O. v. FC Krylia Sovetov Samara, award of 6 March 2008[EB/OL].(2008-03-06)[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1369.pdf>.
- [13] Subhan A. Football Transfer Fees: Anticompetitive? [J]. Sports Law, Policy & Diplomacy Journal, 2023, 1 (1): 159-188.
- [14] CAS. Arbitration CAS 2017/A/4935, FC Shakhtar Donetsk v. Olexandr Vladimirovich Zinchenko, FC UFA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award of 26 October 2017 [EB/OL].(2017-10-26)[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4935.pdf>.
- [15] 向会英, 张林. 职业足球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赔偿的CAS法理[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55(12): 48-55.
- [16] Czarnota P A. FIFA Transfer Rules and Unilateral Termination Without “Just Cause” [J]. Berkeley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Law, 2013, 2 (1): 1-47.
- [17] DRC. DRC FPSD-13969, Massafi Al-Jonob v. Musa Esenu and Bul Football Club, Ref, decision of March 27 2025[EB/OL].(2025-03-27)[2026-03-01].https://digitalhub.fifa.com/m/4a6f57a63e59a0d6/original/Esenu_27032025.pdf.
- [18] CAS. Arbitration CAS 2016/A/4408 Raja Club Athletic de Casablanca v. Baniyas Football Sports Club & Ismail Benlamalelem, award of 29 June 2017[EB/OL].(2017-06-29)[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4408.pdf>.
- [19] 向会英. 国际体育仲裁院职业足球争议仲裁法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4: 163-168.
- [20] CAS. Arbitration CAS 2015/A/3953 & 3954, Stade Brestois 29 & John Jairo Culma v. Hapoel Kiryat Shmona FC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award of 30 November 2015[EB/OL].(2015-11-30)[2026-03-01].<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pdf/3953,%203954.pdf>.
- [21] DRC. DRC FPSD-14413, New York Red Bulls v. Al-Taawoun FC and Alejandro Sebastian Romero Gamarra, decision of September 18 2025[EB/OL].(2025-09-18)[2026-03-01].https://digitalhub.fifa.com/m/ac003b0c8013fb21/original/FPSD-14413-Romero-Gamarra_EN_18092025.pdf.
- [22] de Weger F M, Luckson D J. Player Transfers[M]//Houben R.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Club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3: 274-279.
- [23] Dupont-Hissel. Following a decision by FIFA, Lucas Ribeiro Costa has receive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Certificate (ITC) [EB/OL].(2025-09-12)[2026-03-01].https://www.dupont-hissel.com/en/news/89_following-a-decision-by-fifa-lucas-ribeiro-costa-has-received-the-international-transfer-certificate.
- [24] Quinn P. The Analysis Series: Post Diarra (part II),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football transfer system [EB/OL].(2026-01-15)[2026-03-01].<https://theesk.org/2026/01/15/the-analysis-seriespost-diarra-part-ii-further-analysis-of-the-football-transfer-system-jan-2025-present-day/>.
- [25] FIFA. Explanatory Notes Interim Regulatory Framework [R/OL].(2024-12-22)[2026-03-01].<https://digitalhub.fifa.com/m/74181ed7a6156d32/original/Explanatory-notes-on-the-interim-regulatory-framework.pdf>.
- [26] Freeburn L.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Sport: Power,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M]. Leiden: Brill, 2018: 102.
- [27] 郭树理, 苏圣翔.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管理权的正当性困境与应对策略: 评《管理国际体育: 权力、权威与正当性》[J]. 体育与科学, 2025, 46(2): 19-30.
- [28] Bantekas I, Mercado Jaén P J. Addressing the Unfettered Authority of Sport Governing Bodies through EU Competition Law: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and European Super League [J].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2024, 26: 48-62.
- [29] Duval A. The FIFA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 Transnational Law-Making in the Shadow of Bosman[M]// Duval A, Van Rompuy B. The Legacy of Bosman: 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Law and Sport. The Hague: T. M. C. Asser Press, 2016: 81-116.
- [30] FBI. International Soccer Officials Indicted ‘Deep-Rooted’ Corruption, Racketeering Alleged[EB/OL].(2015-05-27)[2026-03-01].<https://www.fbi.gov/news/stories/international-soccer-officials-indicted>.
- [31] Ingle S. Fifa facing urgent calls to investigate Qatar World Cup bid claims [EB/OL].(2019-03-10)[2026-03-01].<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19/mar/10/qatar-fifa-world-cup-2022-damian-collins>.
- [32] Pillay N. Email from Navi Pillay to Fatma Samoura, Secretary General, FIFA [EB/OL].(2017-05-17)[2026-03-01].<https://www.parliament.uk/globalassets/documents/commons-committees/culture-media-and-sport/170517-Navi-Pillay-to-FIFA-Secretary-General.pdf>.
- [33] FIFA. FIFA to open global dialogue on article 17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 following Diarra ruling [EB/OL].(2024-10-14)[2026-03-01].<https://inside.fifa.com/transfer-system/news/fifa-to-open-global-dialogue-on-article-17-of-the-regulations-on-the-status-and-transfer-of-players>.
- [34] García B. Down with the Politics, up with the Law! Reinforcing EU Law’s Supervision of Sport Autonomy in Europe[J].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 2023, 23(4): 416-421.
- [35] UEFA. European football unites behind key principles of the football transfer system and its reform[EB/OL].(2025-12-01)[2026-03-01].<https://www.uefa.com/news-media/news/02a0-1f559bb04b12-6d3da98e0d31-1000---european-football-unites-behind-key-principles-of-the-foot/>.
- [36] Reuters. Players’ unions file legal claim against FIFA over expanded Club World Cup[EB/OL].(2024-06-13)[2026-03-01].<https://www.reuters.com/sports/soccer/players-union-fifpro-files-legal-claim-against-fifa-2024-06-13/>.
- [37] FIFPRO. Player unions and leagues file complaint to European Com-

- mission over FIFA's im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 match calendar[EB/OL]. (2024-10-14) [2026-03-01]. <https://www.fifpro.org/en/articles/2024/10/player-unions-and-leagues-file-complaint-to-european-commission-over-fifas-imposition-of-international-match-calendar>.
- [38] 吴锦宇,徐漪.欧盟集体谈判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借鉴经验[C]//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大学生实践基地,2017:378-389.
- [39] 于鸿贤.职业体育集体谈判主要法律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22.
- [40] 姜熙,谭小勇,向会英.职业体育反垄断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78-183.
- [41] Goodwyn B. Bargaining Across Borders: The Prevalenc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in American Sports and the Potent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Model Into the English Premier League [J]. Jeffrey S. Moorad Sports Law Journal, 2025, 32(1): 155-202.
- [42]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lbany International BV v
- Stichting Bedrijfspensioenfonds Textielindustrie (C-67/96), Judgment of the Court [EB/OL]. (1999-09-21) [2026-03-0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CS/TXT/?uri=CELEX:61996CJ0067>.
- [43] Monti G. Collective labour agreements and EU competition law: five reconfigurations [J].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2021, 17(3): 714-744.
- [44] Szpunar M.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Szpunar delivered on 30 April 2024,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vs BZ [EB/OL]. (2024-04-30) [2026-03-0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62022CC0650>.
- [45] 张润晨,张峰瑞,柳雨欣.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研究:基于英格兰“政府与志愿部门合作协议”[J].湖北体育科技, 2024, 43(1): 41-46+77.
- [46] 郑春荣.规范分析视角下的欧盟新型治理模式:“社会对话”[J].欧洲研究, 2008, 26(2): 104-120+161-162.

(上接第16页)

工作者及运营机构负责人进行培训,内容应涵盖项目管理、智慧平台运用、公众沟通等,全面提升个人能力素质。

最后,有效的社区协同是确保治理效能落地、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基础。公共体育空间的最终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其需求满足度和参与度是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应建立健全社区民意征集与反馈机制,在项目规划、设计乃至后期评估阶段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源支持等方式,大力培育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引导其深度参与场地设施的日常管理和活动组织,提升公共体育空间的使用率^[15-16]。

4 结语

本研究以宁波市鄞州区“嵌入式体育新空间”为典型案例,从治理创新内核出发,系统剖析了其实现公共体育空间集约化发展的治理逻辑运行机制。鄞州实践的成功,本质上在于其构建了一套以多元共治为组织基础、以制度与技术为双轮驱动、以价值融合为功能导向的集约化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与协作机制,有效激活了社会资源的参与活力,通过标准化规范、智慧化平台与绩效化评估等制度技术安排,保障了运营管理的可持续性与精准性,最终通过“体育+”融合策略,实现了公共空间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价值的协同增益,使其从单一的健身场所演进为促进社区融合、激发城市活力的综合性平台。

参考文献:

- [1] 蔡玉军,邵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40(3):38-42.
- [2] 李龙,陈淦滨.走向空间正义:城市社区体育公共空间服务多维优化策略[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10):867-870+926.
- [3] 赵赞.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内容与效应的链式多重中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1):55-63.
- [4] 甘雨晴,刘如,张继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选择[J].湖北体育科技,2025,44(1):103-107.
- [5] 陆小荣.价值引领绿色践行:招商银行信用卡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信用卡,2023(10):8-11.
- [6] 蔡玉军,邵斌.问题与策略: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集约化发展模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30(6):467-473.
- [7] 蔡玉军,邵斌,魏磊,等.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结构理想模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27(5):432-436.
- [8] 李冬梅,陈俊涛.美好生活视域下全民健身公共体育空间的价值、困境与发展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3,42(6):95-101.
- [9] 梁勤超,李源,石振国.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社区体育公共空间供需矛盾及其化解[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7,32(3):208-212.
- [10] 刘瑞超,郑家鲲.城市更新视域下嵌入式健身空间发展:内涵、逻辑、镜鉴与策略[J].体育科学,2024,44(7):25-34.
- [11]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 [12] Osborne D, Gaebler T.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M]. New York: Plume, 1992: 25-48.
- [13]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0.
- [14] 李龙,肖志果.我国社区公共体育空间共建共治共享探赜[J].体育文化导刊,2023(6):61-67.
- [15] 于燕燕.协同共治:社区治理新思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12.
- [16] 赵文华,陈元欣.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25,44(1):114-118.